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TONGSHI
MINGUO WENHUA

k295.1
X68a8

上海通史

熊月之 / 主 编

第

卷

10

民国文化

许 敏 著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A0909481

第一章 民初：新文化的氛围

晚清开始,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伴随着上海城市社会生活而发展起来的新式文化事业的崛起,上海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尽相同的情形。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上海就成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集结地^[1]。最早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上海和江南一带的旧文人、士绅转化而来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在江南的拉锯战,使得上海一隅成为躲避战火的江南难民的栖身之地,江南文人也因此流入原先被他们认为是“风俗鄙陋”的上海^[2]。这些人进入上海后,谋食于城市新式的文化事业机构,以传播西学或者从事城市大众文化事务为主要职责。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江南文人受到新式文化机构的制约和改造,另一方面江南文人的文化色彩深深地影响了晚清上海的文化气氛。实际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大批接受了西方文化训练的留学生归国,以及许多从内地其他地方新来上海者加入到文化事业行列中,上海的文化色彩才有了较明显的变化。

一 清末民初上海文化的趋向

由于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特性,随着城市近代化的日趋完善,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脱离清朝中央和文化正统,上海的知识分子不仅处于引进西学的最前沿,而且形成了一种借用西方文化来批判传统的风气^[3]。同时,传统文化在上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情趣正在被市民情趣所替代,那些过去非传统的、非典籍的、民间的、在野的文化形式,逐渐成为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东西。这种颠倒雅俗的情形是对正统观念的挑战与背叛,并且为知识分子所重视。19世纪后半叶起,上海文化的发展明显带有一种趋新、趋欧化的倾向,这种新的文化倾向由于受到整个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的支持,更显得坚实和有力。

晚清以降,由于上海整个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文化事业也取得了不少建设性的成就,上海正在从“文物寂寂”、“海氛甚恶”的地区,转变为全国文化的一个中心。这种转变也是由上海社会的经济状况促成的,上海的文化发展受到了自由经济的推进。很明显,上海的新式文化事业,是靠商业原则建立起来的。晚清上海是中国新学传播的基地,这种地位的形成,也是由上海文化机构的现代化机制造成的。冯自由曾描绘过那种情形:“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学新学。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实于意云何,于是联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麀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4]上海的

教育、出版、大众媒介、演出等文化市场,就是在这样一个较成熟的商业机制下迅速壮大起来,它所散发的巨大能量是中国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上海的文化人在这期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同地处京师政治中心的文化人相比,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海文化人,对于政治压力的感受也许不如身处首都的北京文人那么直接和强烈,所以,相比之下,来自江南的文化人对政治的热情要淡漠一些。“从武昌起义,一直到清帝让位,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大关系,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吃馆子换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觉,到明天起来,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5]对于腐败的清政府,晚清上海的文化人早已由愤慨转变为蔑视嘲讽,鲁迅在论述晚清上海小说风气时曾分析到:“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6]《官场现形记》之类的“谴责小说”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而上海文人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许更体现于《海上花列传》之类的文化中。

戊戌变法失败,令许多渴求进步的文化人士感受到极大的挫折。许多人清楚地看到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必然崩溃的命运,但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局面产生焦虑。就在辛亥革命山雨欲来的1911年,商务印书馆准备编印下学期的教科书,他们对于是否废弃“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旧课文,仍旧犹豫再三。当商务请教于有“智多星”之称的陆费伯鸿时,陆费伯鸿充满无奈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都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商务信其所言,仍旧印行旧本^[7]。虽然事后证明陆

费伯鸿的话有故意误导之嫌,但商务之所以相信,是因为这话说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当时,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都充满了一种期待感,许多人谶语般地把世纪之交看作是新旧秩序交替的象征。20世纪初年报章上出现了很多对新文明、新文化的欢呼与讴歌,人们企图用文化上的转变来推动政治上的革故鼎新,以新文化的建立去促进新世界的实现。梁启超认为新小说对于改良群治、培养新民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陈独秀认定改良戏曲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但在实际中,新小说没有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新剧在上海的演出也是观者寥寥,难以维持。所谓新文化,在这时并没有太多新的内涵和发展因素,也缺乏蓬勃的生机。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这十来年,在知识分子中积聚着愤懑,充满了期待。这期间的学术文章和文艺作品,大都以批判、揭露为主,呈消极破坏状,“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8]

二 民初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上海各界对之反应激烈,各家报刊杂志纷纷增出号外、专版扩大消息内容,整个社会低沉的情绪因之激奋,其时,只要是激进的词语、革命的口号就会有读者、有听众。辛亥革命的成功,对向往民主、渴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鼓舞,正如胡适所言:“(辛亥革命)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9]民初,一些崇尚自由、接受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改晚清时的消极状态,纷纷奔走呼吁,欲建设和创造与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文化。但是,民国初年政局的纷乱,给这种建设和创造的

热情带来了损害。在南北帝制与共和政治的对峙中,上海自然成为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的政治基地。为准备自由选举、议会政治,各政治党派、团体风起云涌,这些政团大多以上海作为活动阵地。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上海,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上海新创刊的报纸杂志就有60多种^[10]。这些报章杂志主要以政论为主,不少文化人士卷入政治党派之争,忙于互相攻讦、辩驳,在文化思想上建树很少。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以后,孙中山急忙从日本长崎赶回上海,章太炎也由东北弃官南下上海,一时上海笼罩在政治的骚动与不安气氛下,上海的不少文化人又开始产生了厌倦和怀疑的态度,而上海的社会生活在经过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冲击震荡以后,逐渐又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

民初的上海,人们在文化上都希望寻求新的东西。一般市民的文化兴趣也同晚清时有了明显不同,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哀情缠绵的东西比以前更受欢迎。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庭伦理新剧等在这个城市中有了更多的爱好者,当然这种情形和正在变化着的市民结构也有莫大的关系。同时,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也在苦苦寻求。20世纪初年,有人希望用新文化来促进新世界的到来,但却无人提供新文化的真实内容,这个以文化革命推动政治革命的梦想未能实现。辛亥革命似乎在一夜间轻易解决了政治上革故鼎新的过程,于是不少人觉得应该借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来激发新文化的创造。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从20世纪初起就不断地被议论、争辩,一直延续到30年代。袁世凯的专制和二次革命的失败,令人感到新政治体制尚未真正确立,更何论激发新文化。新文化从20世纪一开始就被入千呼万唤,但迟迟未露出真容。1915年6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避祸的陈独秀回到上海,陈独秀经过沉思之后,认识到:“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根源在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

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11]。因此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而思想革命就是从建设新文化起。

三 《新青年》的创办及其意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该刊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地亮出建设新文化的基石:科学与人权(民主)。陈独秀宣称,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从洋务运动引进“坚船利炮”,到戊戌变法尝试“立宪民主”,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还没有结果就转入了本末之辩。20世纪初年,中国人又发现“道德伦理”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这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既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中国人希望富国强兵、赶上西方的急迫心情。西方文化被割裂开来、被仿效,而且每遭挫折,就另择捷径,这就使近代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中充满了曲折。

早在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由介绍西方天文学起,将西方近代科学输入中国。从江南制造局译书开始,上海就成了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的窗口。上海所翻译的关于西方科学的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首屈一指,大大地领先于全国^[12]。开埠以后,从“地火”、“天灯”等市政新貌到机器车船等工业生产,近代科学从非常具体的成果起,与上海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意义的“民

主”概念引入中国,最早见于 1864 年出版的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78—1890 年,郭嵩焘、黄遵宪、薛福成等又把相近的“民权”观念介绍到中国^[13]。此后,中国知识人士对于西方民主的介绍与讨论,一直十分热衷。近代上海,如果不算租界内西人搬用西方的政治统治模式所建立的一套管理制度,只就华人而言,通过地方自治、新闻舆论自由等,上海人享受到的近代民主权利无疑比中国其他地方相对地要多一些。所以,《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在上海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它在沪创刊后,虽被一些人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但每期的发行量(包括赠送和交换)不过一千份。

《新青年》毕竟不是一般性地谈论科学与民主的杂志,它是把科学与民主作为一套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确立起来,使之成为新文化的基础。《新青年》及由其肇始的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树立科学与民主的权威与神圣性。尤其是科学的尊严,通过新文化运动已经牢固地确立。胡适曾经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4]有人指出,在近代中国提倡科学的过程中,有一种把科学价值绝对化的倾向,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常常把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同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等同起来^[15]。这确实是一个偏差。然而,被赋予神圣性的科学强有力地抗衡了旧的价值观念,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文化改革的基础,用实行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中国建立了新文明的支柱,因此,蔡元培把新文化运动比作使欧洲走出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1917 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了北京。在这以前,1916 年蔡元培开始主持北大校政,包括上海在内的一大批南方知识分子纷纷受蔡元培感召萃

集北大,成为教学骨干或学生。新文化运动因此产生了更加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四 新文化氛围下的民初上海文化

有的学者研究了明清以降南北文化的格局问题后指出,明清时期江南由于其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始终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之一,而京畿主要是一个文化的表现场所。“江南——京畿”轴心至近代又以“京——海”轴心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情景到清末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上海成为一个现代化都会后,发展十分迅速,原来的南北势态产生了倾斜,上海褪去地方特色成为全国中心^[16]。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对清朝中央离心力日渐增大,而且依仗其特殊的政治局面成为反对清朝中央的重要基地,中央对上海也十分拒斥,京、海日趋对立,文化源流阻塞。清末的京城在文化上日益凋敝,文化优势渐失,这种局面在戊戌变法后更加明显。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也很为兴奋,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北上有所作为,典型的像邵飘萍等人则前往北京从事开辟新闻事业,上海各大报章也往北京派驻记者和特约通讯员。他们将上海的那种富有效率的行事方式带到北京,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民国初年南北政治上的对立,也加剧了南北文化上的隔膜和对立,黄远庸的被谋杀和邵飘萍的遭通缉,使人们觉得北方的文化环境十分恶劣,于是除了孔教会由上海北迁以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文化输往京城。北京逐渐成为保守的象征。1912年3月,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留学生和著名学者胡敦复、严海澜、朱晚香、吴在渊等11人,因不满北京文化气氛和清华学规,相约返沪,兴办了私立大同学院,聘马相伯、蔡元培、杨杏佛、胡适、徐新六等人为校董,胡敦复为校长。民国建立后,北京的一

些旧文人努力剪裁旧传统以应付新局面。他们一面宣扬古文为“宇宙古今之至美”，坚守古文，一面又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适合“芸芸亿兆”的文化教育^[17]。这种文化上的保守局面，直到南北文化交流重新疏通后才有改观。

1916年袁世凯病死，南北对峙有所缓和，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后南方文人、学者络绎不绝北上活动，北京又成为一时的文化中心和表现场所。蔡元培的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在其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便有所萌芽。黄炎培回忆说，蔡元培所教的中文课程，是在哲学、文学、政治等二三十门类中，“让个人认定一门，蔡师就这一门出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图书馆借书阅读。每天须写笔记送师批阅”，“蔡师不但亲手批阅，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蔡师房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今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请教”^[18]。蔡元培当时非常注意启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关心时事的精神，并强调自由、切实的教学。他每天出题给学生作文，“题材是不拘的”。为培养学生传播知识的能力，他“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19]。1902年11月成立的以蔡元培为总理的“爱国学社”，即是以后他在北大所倡导的风格的牛刀小试。学校聘请上海知名学者授课，内部组织采取学生自治方式，一切兴革事宜概由学生开会决定。校内自由空气浓厚，师生放言无忌，因面有张园演讲和“苏报案”轰动一时。蔡元培日后在北大的改革，则是“自由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在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前，北大充满了旧的道德风气，教授和学生聚赌、嫖妓、捧戏子。蔡元培在北大提倡新道德风气，1918年北大成立了进德会，有一千多人参加。该会提倡新道德风气，禁止全体会员狎妓、赌博或纳妾。这个组织是依照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1912年在上海创办的类似组织形式而筹办的。^[20]

陈独秀在发起新文化运动时曾经打算通过新文化运动，再影响

到军事“令战争止住”，影响到产业“令劳动者觉悟”，影响到政治“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21]。《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之际，上海的文化界有一种浓重的厌倦政治的情绪，这当然也是出于对当时政团纷争、政治黑暗局面的失望和反抗。在这种氛围影响下，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时，也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青年》早期在上海的活动也大致不出此旨。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22]。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北京后，与整个旧制度、旧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日益同实际的政治斗争形式联系在一起。陈独秀本人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同李大钊一起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上街散发，结果被军警逮捕。当北京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受新文化运动启蒙的京津青年学生来沪，鼓动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在他们的鼓动下，上海不仅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而且在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生两万余人实行总罢课，随即商人和工人纷纷罢市、罢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样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这是极富有意味的。

当然，上海之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有着自己的硕果和独特贡献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出版的书籍有相当一部分由上海代销，如上海亚东图书馆就曾代理经销北大出版的书籍，而《新潮》、《每周评论》等期刊，都是直接拿到上海来出版的。在全国以传播新文化著称的“四大副刊”中，上海就占了两家，这就是《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但以介绍西方学术流派和探讨社会主义问题著称，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摇篮之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上海的文化界和知识界开始更加深入地、理性地思考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和前途问题。1920年2月，当陈独秀携《新青年》编辑部重回上海时，上海的文化人士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就。尤其是1919年6月和8月先后

创刊于上海的《星期评论》和《建设》，上面所刊登的一系列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劳动问题以及历史和哲学史诸问题的文章，其水准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刊物。

“五四”发展为“六三”；《新青年》突破了不批评时政的诺言变成一份纯政治的刊物后，也返回上海；北方大批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不堪北京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陆续南下；2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中心，也由北京移至上海。新文化运动所有的成就——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精英人物，几乎全部回到了新文化的发源地，这是极有戏剧性的回归。而在上海，新文化已经积蓄了相当雄厚的力量，将号召变为实践。

【注 释】

- [1] 熊月之：《新型知识分子集结》，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4—1029页。
- [2]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3] 李天纲：《一种过渡形态的城市生活——知识阶层的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4] 冯自由：《政治学序言》，冯自由：《政治学》，广智书局1902年版。
- [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页。
- [7] 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 [8] 天僊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载《月月小说》1907年第1卷第11期。
- [9]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6页。
- [10]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 [1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一）》，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5页。
- [12] 熊月之：《1843—1898：上海与西学传播》，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 [13]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页。

-
- [14]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第 2 页。
- [15]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 [16] 李天纲:《“海派”内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143—1144 页。
- [17]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 13 页。
- [18] 黄炎培:《八十年来》,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048 页。
- [19] 黄炎培:《八十年来》,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048 页。
- [2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 页。
- [21]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张若英(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 1934 年版。
- [22]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 年版,第 96 页。

第二章 20 年代的文化环境和留学生的归来

经过五四运动疾风暴雨的宣传方式以后,新文化从 20 年代起逐渐开始向社会深入。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由于相对地远离政治中心,使得文化、思想有一个较平和的生存环境,成为新文化的重要实践阵地。文化的变革,由宣传变为现实。

一 20 年代上海的文化环境

五四运动在北京造成的政治激荡,使得北京的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压抑,文化环境也因此变得较为恶劣。1919 年 5 月 9 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上海的一些朋友也为陈独秀担心,认为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1]。果然,1919 年 6 月 11 日晚,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军警抓获。在各方的奔走和营救下,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北京政府当局在将陈独秀关押了 98 天之后,终于释放了他。1920 年 1 月陈独秀离开了北京,1 月 29 日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因此从北京搬回上海。1921 年 6 月,由于北京政府拖

欠教师薪水,引起了教师的不满。6月3日,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师到教育部请愿,催讨欠薪,在新华门前与军警发生冲突,许多教师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教授马叙伦被打成重伤。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学校联合大罢教。这以后,北京的不少大学教授,也因为不满北京的文化气氛,陆续离开北京南下。正如鲁迅说的:“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2]

尽管上海也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纷争的桃花源,租界当局也不断地采取措施压制和取缔他们认为的异端邪说,但由于上海特殊的统治格局,两个租界当局和华界当局对于思想文化的禁忌各有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不尽一致。这造成了上海思想文化的活跃空间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宽阔,加上上海的文化事业发达,使文化人士的生存环境要优于当时的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

上海成为新文化事业的中心,是由这个城市开放的格局造成的。20年代的上海,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的传媒和出版等现代文化机构。上海的这一优势,使得经由上海展开的文化活动,其影响早已超过了上海一隅而成为全国性的。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3]。的确,中国古代的文化流派、学派往往是以地域命名的,如稷下学派、江西诗派、松江画派等,但现代文化上的学派、流派往往是以媒体来命名的,如语丝派、新月派、战国策派等,这表明媒体在现代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不少社团的成员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如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四川的文学青年,但是他们还是以杂志和刊物来命名,这也显示了媒体在现代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梁实秋在回忆中讲到了20年代中国文化人士聚集上海的情形。

1927 年春,因为北伐军进入南京郊外,梁实秋和余上沅等一些东南大学的教师,为躲避战火纷纷由南京来到上海。“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平的国立八校经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亦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其中一部分逃到上海。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时候到了上海居住。”“同时有一批批的留学生自海外归来。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人在外国久长居留作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留连忘返。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4]

二 上海为留学生所青睐

20 世纪开始,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也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到中国,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当其冲。如果说,在 19 世纪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上海的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桥梁作用的话,那么,到 20 世纪以后,这种角色就由留学生替代了。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出去和归来,这种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和世界文化交融的一道风景线。

上海是亚洲最重要的航运中心,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上海就已经联结世界上任何一个通航地点。上海逐步建立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西而有长江航线,北面有北洋航线和朝鲜、海参崴航线,东面有日本航线,西南面有菲律宾航线,南面有宁波、福州、台湾、汕头、香港以

及南洋和澳洲连接欧美航线的航运网络^[5]。这样,上海也就是中国通往世界的码头,从晚清开始出洋的留学生,大多数人都是由上海出发、走向世界的。

1874年9月19日(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九日),中国最早官方派遣的第三批留美幼童34人,从上海登船,前往美国。护送幼童出洋的清江北海关官员祁兆熙,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由上海出发的情景:

是日也,己卯,晴,礼六。午刻有细雨,即止。九点钟,同容阶到万昌轮船公司写定舱位,计三十四人。船名‘矮而寡南’。值舱面六间,每间住三人;中舱大菜房后面四间,每间住四人。”“余与诸生坐中舱,即西人所谓大菜间,室洁灯明,光彩交映。船尾洋泾浜一带,自来火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诸生俱乐。

初十日庚辰 礼拜日。卯初船行,诸生咸起观,余亦起,嘱着暖衣服,勿受寒。辰正出吴淞口。^[6]

蒋梦麟在其自传《西潮》中,为人们记下了20世纪初年留学生从上海出发赴美的情景:

我拿到医生证明书和护照之后,到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请求签证,按照移民条例第六节规定,申请以学生身份赴美。签证后买好船票,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旧金山。那时是1908年8月底。同船有十来位中国同学。邮船启碇,慢慢驶离祖国海岸,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秋千,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7]

此后,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就这样从上海登船“出吴淞口”,去美国,赴日本。1919年3月17日,中国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行89人,由沪启程,前往欧洲。以后,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又乘船“入吴淞口”,回到上海,或经上海到中国其他地方。

上海是中国通向世界的码头,也是世界进入中国的港口。20年代时,由上海开往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可以直接到达伦